

批判性地緣政治與外交政策分析： 以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為例

李 俊 毅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從批判性地緣政治 (critical geopolitics) 的角度，藉由波士尼亞戰爭 (1992-1995 年) 此一案例，探討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深受國際關係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的影響，批判性地緣政治旨在問題化 (problematize) 地緣政治的思想，主張地緣政治的基本元素，例如主權、領土、疆界、民族國家等，其意義不是既定的，而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外交政策的功能之一，即是藉由賦予特定「他者」一個地緣政治的意義，建構或合理化國家的政策選項。據此以觀，美國由不肯／不能出兵波士尼亞，到最後積極介入和平協議的簽訂，或可詮釋為是原先政府或政治菁英對於波士尼亞的主流建構—歷史仇恨與種族衝突—逐漸受到另一套「大屠殺」論述挑戰 (但非取代) 的緣故。最後，本文將指出，雖然這樣的研究途徑似乎確認了「西方」的權力能力，從而強化了現實主義的論述，但二者之間所開展出來的、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與研究，卻是大不相同的。

關鍵詞：批判性地緣政治、論述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波士尼亞戰爭

* * *

壹、前 言

本文擬探討批判性地緣政治 (critical geopolitics) 此一途徑所開展出的外交政策分析，並以美國在波士尼亞戰爭 (1992-1995 年) 時期的政策為例加以說明。隨著冷戰的結束，自 1970 年代以來居主流位置的結構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漸漸受到挑戰，若干人文與社會學科的變遷，諸如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the linguistic turn)、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在各學門的興起、以及對社會理論 (social theory) 的重視，皆使國際關係理論呈現多元的發展。^①此一多元化不僅表現在諸多基進 (radical) 或反思 (reflectivist) 理論的出現，^②也反映在學者對於認同、脈絡 (context)、文化與意義等概念的強調或重新檢視。在此背景下，批判性地緣政治之所以具「批判性」，係因它拒斥了原本地緣政治學派主張地理環境是國家政略客觀條件的假設，轉而強調地理空間的意義，以及據此而來的可能政策選項，都是建構的。兩者所推導出的外交政策分析，因而在認識論、分析層次以及研究焦點等各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在於引介批判性地緣政治此一在政治地理與國際關係學界均屬相對新興的途徑。臺灣在這方面的作品，除了莫大華教授的研究論文整理並回顧既有文獻之外，^③尚十分少見。本文則除了理論層次的介紹之外，亦擬討論該途徑在實務層次上的應用，而聚焦於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

本文所討論的波士尼亞戰爭，意指 1992 年間，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所屬之波士尼亞－赫塞戈維納 (Bosnia-Herzegovina，以下稱波士尼亞) 經由公民投票決議自聯邦獨立，並獲得歐洲共同體與美國的承認，而引發境內塞爾維亞裔對克羅埃西亞人與回教徒的衝突，以及鄰近塞爾維亞共和國的武裝干預之情事。其後戰爭快速升高，三個主要族群－塞爾維亞裔、波士尼亞克人 (Bosniak 回教徒) 與克羅埃西亞人－彼此征戰，導致大量的傷亡與流離失所。同年 7 月起，有關集中營與種族清洗的消息即漸次為媒體所披露，而形成要求西方國家進行干預的壓力。時任歐洲共同體輪值主席的英國於 8 月召開倫敦會議 (the London Conference)，設立和平談判的架構。9 月，聯合國安理會第 776 號決議將原先在克羅埃西亞的維和部隊 (UNPROFOR) 延伸至波士尼亞。1993 年 1 月，聯合國任命的調停者 Cyrus Vance 以及歐體的調停者 David Owen 提出和平計畫 (the Vance-Owen Peace Plan)，倡議將波士尼亞依族群分佈比例劃分為十個區域，但不被塞裔、波士尼亞回教徒、甚至美國柯林頓政府所接受。隨著衝突的加劇，聯合國安理會第 819 號決議宣布 Srebrenica 一個由波士尼亞回教徒難民聚居的城市－為一個「安全地區」(safe area)，並先後增列若干其他地點，但缺乏足夠的力量保護這些地區的安全。

後續的發展，基本上是塞爾維亞持續的暴行、一系列和平協議的失敗，以及聯合國與北約間歇性的對波士尼亞塞爾維亞裔的空襲。1995 年 7 月，被聯合國劃為安全區的波士尼亞境內小城 Srebrenica 裡，約有 8000 名男性回教徒遭到塞爾維亞軍隊的殺害，其餘婦女則遭到輪暴。隨著「種族清洗」的傳聞與報導不斷出現，西方國家改持較強硬的立場。美國亦一改不積極介入的立場，而主導和平談判的進行。1995 年 12 月 22 日，和平協議在美國 Ohio 州的 Dayton 由交戰各方簽署，正式終止戰事。據 2007

註① Stephanie Lawson, *Culture and Context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Ch. 2.

註② 參見 Steve Smith,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9-245.

註③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 2 期 (2008 年 6 月)，頁 57-85。

年的統計，在 1992-1995 年這段時間的衝突裡，造成至少約 9 萬 7 千名的死亡與失蹤人數。^④而今，波士尼亞－赫塞戈維納受到國際承認，但是受到國際的監管，並分為兩個大致相等的實體：波士尼亞－赫塞戈維納聯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cegovina），以波士尼亞克人與克羅埃西亞人為主體，以及以塞爾維亞裔為主的塞爾普斯卡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

在此一衝突過程中，一個廣為批判的議題是西方－尤其是美、英、法等主要國家－的消極與被動。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種族屠殺的慘劇，國際社會曾矢言不再讓「大屠殺」、「集中營」、「種族滅絕」再次發生，^⑤然而五十年後，類似事件卻又再度發生，且發生於歐洲。在許多評論人看來，這毋寧是西方國家在外交以及／或道德上的失敗。^⑥以美國來說，波士尼亞戰爭是後冷戰時期繼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後的第二個大型國際危機，而美國在這兩次衝突裡的表現卻迥然不同。波灣戰爭時，美國與其他西方主要國家標舉著「正義戰爭」（just war）、「新世界秩序」的旗號，組成同盟積極對抗伊拉克，然而對於發生在波士尼亞的衝突，美國卻持續拒絕派遣地面部隊進駐當地，並以「殘忍且無意義的屠殺（slaughter）」視之，認為「外界能做的非常少」。^⑦1994 年 5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更在一場由 CNN 舉辦、向全球播放的視訊談話中宣示，針對諸如發生於盧安達與波士尼亞的人道災難，「美國不能解決每一問題且不能成為世界警察」，呈現出一種消極、被動的態度。^⑧直到 1995 年夏天，此一立場始有所改變：美國支持透過北約展開持續性的轟炸、斡旋促成 Dayton 協議的締結、以及派遣 20000 名地面部隊執行並確保協議的履行。^⑨此一過程如何可能？美國政府為何能坐視衝突不斷升高、又為何最終進行干預？這是本文試圖藉由批判性地緣政治加以探討的問題。

進一步來說，本文著重的，是「如何」（how）以及「如何可能」（how possible）的問題，而與既有的理論架構關切「為何」（why）的問題有所不同。後者的不足之處

註④ “Human Losse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91-95,” The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er (RDC), Sarajevo. [Online] <http://www.idc.org.ba/presentation/content.htm> [Accessed 24 July 2009].

註⑤ 最具體的事證，當屬 1948 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註⑥ 參見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Yugoslav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Brendan Simms, *Unfinest Hour: Britai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osnia* (London: Penguin, 2001); Gearóid Ó Tuathail, “A Strategic Sign: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Bosnia’ in US Foreign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17 (1999), pp. 515-533.

註⑦ Riikka Kuusisto, “Framing the Wars in the Gulf and in Bosnia: The Rhetorical Definitions of the Western Power Leaders in Ac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5, No. 5 (July 1998), pp. 609-620.

註⑧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Bosnia’ in the U.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1991-1994,” Gearóid Ó Tuathail, ed., *Critical Geo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88.

註⑨ Gearóid Ó Tuathail, “A Strategic Sign,” pp. 516-517.

在於其預設了「特定行為或政策發生的可能性」。^⑩將焦點放在事件或現象發生的原因，往往接受或預設該經驗現象的合理性，研究的重心因而常是主要決策者的識別及其行動原因的解釋。此一研究取向一方面忽略了從較遠或相異的立場來看，該事件的發生可能是特例、難以想像、甚或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即使我們找到行為者的動機與原因，例如黨派利益、組織本位或國家利益等，行為者仍需一套論述加以合理化特定政策選項，而此論述也是決定該政策選項能否被接受的重要因素。相對的，「如何」以及「如何可能」的問題，則藉由問題化（*problematize*）特定行為或政策，探究其所以能被提出並接受的可能性條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而彌補「為何」問題之不足。換句話說，每一個政策選項背後，都有一套背景知識與言說，以界定發生的事實、責任歸屬，以及合宜的行動方案。如後文將進一步指出的，對於波士尼亞戰爭的本質，有學者主張它是一個現代戰爭，源於對國家、主權、自決、民族等概念意涵的衝突與競逐，^⑪但一般（例如美、英政府、若干媒體）對此個案的解釋與呈現，卻是偏重波士尼亞各族群的歷史仇恨。這兩種甚至其他的觀點都能找到相應的事實依據，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就事實層次進行是非對錯的評斷。任何一個個案在事實層次皆有其複雜性，其意義很難完全為吾人掌握。在此認知之下，問題的重心當從確認事實、找出因果關係，轉而探討在不同且可能的詮釋中，何種解讀方式（而非其他）被政治領袖、官僚組織、以及（或）媒體所採用？它出現的條件為何？並有何政策啓示與效果？

本文選擇以「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作為討論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素材，係出於兩項考量。首先，就特殊性而言，波士尼亞戰爭以其衝突之慘烈，加上主要事件結束已超過十年以上，當前已有相當數量的文獻可茲檢視。而雖然針對「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評論不少，「西方」卻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個體，因此在討論時當以個別國家為對象。本文選擇探討美國，因為作為世界政治裡的超級強國，美國的外交政策本身就是各國國際關係理論所欲解釋與考察的重點。其次，就普遍性來說，由於「美國外交政策」與「波士尼亞戰爭」皆吸引廣泛的關切，此一個案因而可以成為不同理論觀點相互對照與對話的平台。在安全研究上同以西方（美國與歐盟）對波士尼亞的政策辯論為對象的 Lene Hansen 即指出，該案「闡明了理論架構的廣度與深度，以及由此而來的，理論的最廣實證範圍」。^⑫換句話說，本文最終的關懷，並不試圖針對「在波士尼亞一地發生了何事」、「其成因為何」、「美國政府當中的哪些人、基於何種原因、作

註^⑩ Roxanne Doty,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 Post-Positivist Analysis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3), pp. 298.

註^⑪ 例如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Beverly Crawford, "Explaining Cultural Conflict in Ex-Yugoslavia: Institutional Weakness, Economic Crisi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eds., *The Myth of Ethnic Conflict*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8), pp. 197-260.

註^⑫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1.

了哪些決策」等問題做事實的定論，而是著重於探討批判性地緣政治此一途徑所能開展出的，對於外交政策、國際衝突乃至於國際關係的觀察角度。

上述的問題取向，將國際關係的研究帶向國內政治的層次，關注概念、意義或論述是如何被建構與再建構，從而影響可茲選擇的政策選項。批判性地緣政治因其關切空間意義的賦予及其效果，是這類研究取向的途徑之一。諸如波士尼亞戰爭此類的國際衝突事件，所涉及的除了是當地交戰各方的利益與認同之外，也與主要強權（如美國與歐盟）的認同與論述息息相關，因為後者決定涉入與否，以及涉入的方式，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自我的認知與定位。誠然，一個國家的自我定位，經常是國內政治與社會論辯的議題，鮮少能取得一致的共識。整理這些主要的論述，便成為外交政策分析的一個可能面向。

本文的討論將分兩大部分進行。第二節將簡介批判性地緣政治此一相對新穎的途徑。與傳統的地緣政治不同，批判性地緣政治關懷的並不是國家戰略的分析與提供，而著重分析外交政策或特定地緣政治主張的假設、建構與效果。易言之，由於所有（外交）政策都涉及到空間或地緣因素，批判性地緣政治探討的是這些空間的意義是如何形成的。延續此一主軸，第三節將探討美國對「波士尼亞」的意義建構。它首先將問題化美國官方與學界對波士尼亞戰爭的解釋，其次提出批判性地緣政治可能的解讀，最後則是討論後者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第四小節則是簡單的結論。

貳、批判性地緣政治

廣義來說，地緣政治因為結合了「空間」（地緣）與「權力」（政治）這兩大要素，它本質上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主要涉及了國際關係與人文或政治地理學這兩大學門。^⑬「地緣政治」的意涵因而隨著學門內部知識條件的變遷而有不同。

傳統上，「地緣政治」或「古典地緣政治」大抵意指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套理論或學派，強調地理因素—例如大陸與海洋的空間配置，以及自然與人文資源的分配—對於國家的生存、演化與外交政策的影響。這套思想的系譜中，最為人知者包括瑞典的 Rudolf Kjellen、美國的 Alfred Mahan、英國的 Halford Mackinder 以及德國地理學家 Friedrich Ratzel 與軍事將領 Albrecht Haushofer 等。儘管他們的學說互有不同之處，例如 Mahan 的「海權論」主張領土的取得與控制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以海外海軍基地作為（美國）權力投射的基礎，而 Mackinder 的「心臟地帶說」（heartland theory）則強調掌握歐亞此一「世界島」是取得世界霸權的核心，^⑭但其共

註⑬ 地理學可粗分為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而後者又可細分為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等次學門。人文地理因而在概念層次上含括了政治地理。

註⑭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21–56; Colin Flint,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7–23.

同的特色之一，在於皆爲了特定國家的殖民或帝國利益而服務，因此這一時期的地緣政治思想又被稱爲「帝國主義地緣政治」。^⑮

由於地緣政治在德國的發展，被視爲證成了納粹德國的擴張主義政策，此一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受到學界的拒斥。^⑯申言之，受到 Kjellen 與彼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Ratzel 結合了生物學有機生命體的概念，主張每個存活的有機體都需要一個領域，需要生存空間 (Lebensraum)，而文化較先進的國家，因爲更有效率的緣故，應取得更多的土地。此一說法，繼之以 Haushofer 的宣傳，爲希特勒的擴張提供了正當性的基礎，^⑰儘管後續的研究指出，雖然德國地緣政治思想家主張德國的擴張與領土的取得，他們思想的論證過程卻與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大不相同。^⑱到了冷戰時期，隨著美國發展成爲世界強權，「地緣政治」又被用來描述美國與蘇聯彼此間的競爭，並提供美國在戰略思考上的指引。冷戰時期美國地緣政治的發展，在思想上以 Saul Cohen、Colin Gray 以及稍早的地理學者 Nicholas Spykman 爲代表，在實務上則以 George Kennan 與 Henry Kissinger 最具影響力。^⑲也因爲後者的影響，地緣政治一詞往往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 或政治現實主義 (political realism) 同義。^⑳

政治現實的變遷以及人文與社會學科內部的發展，爲地緣政治一詞在 1980 年代以後帶來了新的內涵。首先，到了冷戰後期，國際氛圍對於智識發展的掌控，例如否認彼時地緣政治安排有其歷史特徵、將世界理解爲兩個權力集中於主要首都的敵對陣營、凍結國際疆界以減少區域性衝突將兩大強權涉入時引發軍事升高的機率、以及國家安全的概念不能受到國內的批判或不允許其他替代方案等等，在越戰到蘇聯瓦解這段時間內逐漸鬆脫。其次，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地理學—引入更多來自不同社會與地理背景的人，從而鼓舞了不同的研究取向與議題。最後，若干知識的發展，例如政治

註⑮ Noel Castree, "The Geopolitics of Nature,"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423-439.

註⑯ Klaus Dodds, "Cold War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210-211.

註⑰ Colin Flint,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pp. 20-21; Richard Peet 著，王志弘等譯，*現代地理思想* (台北：群學，2005 年)，頁 18-19。

註⑱ Colin Flint,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p. 21.

註⑲ Colin Flint,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pp. 21-23; Klaus Dodds, "Cold War Geopolitics," pp. 210-213.

註⑳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p. 6. 要特別說明的是，古典地緣政治和現實主義的關係是曖昧不清的，隨不同的解讀而有不同。舉例而言，Dodds 認爲雖然古典的政治地理學者如 Mahan 與 Mackinder 基本上都持國際政治就是權力的競爭此一基本看法，但他們鮮少明確地認知到自身對國際政治的假設。因此，回過頭看，古典地緣政治亦享有古典政治現實主義 (例如 Hans J. Morgenthau) 的基本假設，強調權力政治、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雖然前者可能更著重土地與海洋的力量上。相反的，Deudney 主張，古典的地緣政治學者如 Mackinder，乃至於更早期的思想家如亞里斯多德與孟德斯鳩，明顯的注意到物質脈絡與政治體制—從城市國家的共和國到較大的聯邦體—之間的關係，而這點與當前將地緣政治視爲現實主義同義詞的觀點，是極不相同的。參閱，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0), pp. 40-41; Daniel Deudney, "Geopolitics as Theory: Historical Security Materi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0), p. 78, 100n.2.

經濟學、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在地理學與其他學科內部產生重要的影響。^①其結果之一，是「批判性地緣政治」的出現。「批判性地緣政治」之所以具「批判性」，即因為受到前述思潮的影響，而在理解國際政治與之前的帝國與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上，有了不一樣的視野。^②

「批判性地緣政治」一詞首先由兩位政治地理學者 Gearóid Ó Tuathail (Gerard Toal) 與 Simon Dalby 於 1980 年代晚期提出。^③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發展係受到後現代批評 (postmodern critiques) 的啟發，對於支撐冷戰地緣政治之種種民族主義中心的實踐，提出認識論上的限制。^④受到後現代種種思潮的影響，批判性地緣政治屬於廣義的建構主義之一環，^⑤認為儘管物理世界是真實而具體的存在，但是它的意義卻不是給定的、等待人們去發現的。相反的，事物或事件的意義，是人們透過語言實踐賦予的結果。重要的是，這些語言實踐並不完全是任意的：人們的言說固然在理論上可賦予一個事物無窮的意義，但在實際上，意義的給定是有限的，受到「論述」的規範。「論述」(discourse) 是個廣被使用的概念，但不同的學門與哲學背景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沒有一個共同的界定。^⑥批判性地緣政治對論述的理解大抵是後結構主義式的，認

註①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Gearóid Ó Tuathail), "Introduction,"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4-5.

註② 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有相對於主流地緣政治的「批判性」觀點存在。在 1980 年代初期，這主要表現在若干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作品，以及受到 Wallerstein 影響的「世界體系」政治地理。他們雖然對主流的觀點有所批判，但並不屬於學界及本文所探討的「批判性地緣政治」。另有學者將這些途徑稱為「基進政治地理學」(radical political geographies)。參閱 Peter J. Taylor, "Radical Political Geographies,"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47-58.

註③ Klaus Dodds,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2001), p. 470. 另一說則主張批判性地緣政治是由 Peter J. Taylor 所創，可參閱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頁 60。另外，學者吳志中教授提醒批判性地緣政治在法國的發展，唯此一法國的系譜在當前的英文文獻裡，幾乎付之闕如。法國（甚至其他國家）影響力的缺席，或可以「知識的地緣政治」觀之，亦即理論知識的發展，與國家在政治上的地位有密切的關係。本文不擬針對起源的問題做出結論，但因在當前批判性地緣政治的文獻中，Ó Tuathail 與 Dalby 可說最具影響力，故將焦點放在他們的論述上。

註④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 觀其上下文，此處所謂「後現代」，應是女性、後殖民與後結構主義等不同觀點的集合。以此觀之，Ó Tuathail and Dalby 對 postmodern 一詞的理解是時間性的，把 80 年代以後的世界看成一個現代性之後、「後-現代」的時代，而非一套思想體系（後現代主義）。同樣用法亦見於 Timothy Luke, "Postmodern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219-235。

註⑤ 在此，建構論意指認識論的層次，主張人類的知識是透過特定的社會建制與實踐所建構，而有別於國際關係理論中，以 Alexander Wendt、Nicolas Onuf 與 Friedrich Kratochwil 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建構主義。

註⑥ 對不同論述分析的介紹，可參見 Marianne Jørgenson and Louise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為論述是某種結構性的整體，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界定事物可以被言說的範圍。^⑳ Ó Tuathail 即把論述定義為「一組可能性，允許我們對於世界以及我們的行動與實踐加以組織並賦予意義」。^㉑因此，有別於傳統的地緣政治，批判性地緣政治關切的並不是國家根據其地理條件而應有的軍事與政治策略，而是一如其他批判性的學派，探究國際政治是如何成為吾人當前所理解的樣貌。「地緣政治」的意涵因此不再局限於國家戰略，而是一套論述，「為官員與領導者所引用與使用，以建構並再現世界事務－它的構成地點、關鍵的劇本、與主要角色－以及他們（官員與領導者）在這些戲劇裡的角色和策略」。^㉒

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發展，因此與傳統的地緣政治迥異。Gearóid Ó Tuathail 與 Simon Dalby 提出了五大主張：^㉓

首先，地緣政治並不是如傳統所理解的，是「聰明人的政略（wise-men statecraft）」，而是一個更寬廣的文化現象。它不是關於治理國家才能的一個特別學派，而是關於國家政略本身的空間實踐，不論是物質的或是再現的。批判性地緣政治認為國家的成立與特質，包括國家認同的塑造、疆界的劃分、國土意義的賦予、民族歷史的建構等等，因為都涉及空間的面向，因此是一地緣政治的過程。

其次，因為認為國家是一個持續建構的過程，批判性地緣政治特別關切國家疆界的劃分：具體的與概念上的疆界如何建構出安全的內部與無政府的外部。

第三，因為地緣政治是一個社會與文化現象，它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批判性地緣政治探討的，不僅是「實際的地緣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政治領袖與外交政策官僚組織的實踐，也包括「形式的地緣政治」（formal geopolitics）－智庫、學界、戰略學院等的發展，以及「通俗的地緣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媒體、電影、小說、卡通等對於地緣政治文化的形塑。

第四，批判性地緣政治主張，任何地緣政治的研究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傳統的地緣政治宣稱其能再現國際政治的真實，但對批判性地緣政治而言，此一宣稱本身就是一個論述，是必須受到解構的。同樣地，批判性地緣政治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普遍理論，而是一種「境況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

第五，因為將地緣政治視為「境況的知識」，批判性地緣政治亦探討國家或社會在建構時所涉及的種種技術、策略與科技。視覺科技、科技－領土網路（鐵路、電信、

註⑳ 關於「論述」此一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1); Ole Waever, "Explaining Europe by Decoding Discourses," in Anders Wivel, ed., *Explain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Copenhagen: Copenhagen Political Studies Press, 1998), pp. 100-146; 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註㉑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the War in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2002), p. 605.

註㉒ Gearóid Ó Tuathail, *op. cit.*, p. 607.

註㉓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pp. 2-7.

公路、媒體等)、政府的制度與改革、軍事策略與科技等等，皆成爲研究的題材。

申言之，此五大主張裡的前兩項透露出，批判性地緣政治的主要關切是對國家概念的反省與批判。所謂批判，並不是意味著揚棄「國家」此一在當前社會生活中，仍是最主要政治單位以及認同來源的概念，而是探究關於國家以及其邊界，是如何經由種種空間實踐而建構。Ó Tuathail and Dalby 認爲批判性地緣政治面臨並分析「國家的地緣政治想像」(the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①他們將“imagination”一字拆解成“imagi-nation”，而此一書寫策略一方面呼應了 Benedict Anderson 的論點，認爲「所有範圍比成員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的社群皆是想像的」，②一方面也點出了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研究對象，就是關於國家的種種形象 (images)。這些形象的建構，雖然就其發生的地點而言係屬國內政治的範疇 (例如國民身分的塑造、歷史文化的建構等)，但是在概念層次上，由於一國的形象的特殊性往往是相對於其他「他者」(例如其他國家、區域或文明) 而來，因而亦屬外交政策的功能之一。③如前所述，地緣政治的論述往往爲政治人物拿來回答諸如在何處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事件的主角爲何、屬於何種性質，以及我們 (本國、政府) 在其中的角色與策略等問題。這些看似對世界其他角落所做的客觀描述與剖析，往往隱含了對於本國的自我理解。探究外交政策對於一個事件的表述方式與相關行動，因而能幫助我們認識一個國家自我的建構。

在概念層次上，批判性地緣政治關注國家概念的建構；在研究對象上，批判性地緣政治主張國家形象的生產與建構，涉及了多元的社會位置 (政治領袖、官僚組織、學界、大眾文化等) 以及各式技術與科技 (第三與第五項)。國家概念的塑造，固然是國家機器所欲掌控並主導的，但是此一建構過程卻非全然是由上而下 (top-down) 的。媒體、電影、小說、卡通等各種形式的作品，以及網際網路與多媒體的發達，也可能對既有的論述產生衝擊或強化的效果。Klaus Dodds 即指出，若干漫畫家、小說家與詩人的努力 (如英國漫畫家 Steve Bell 以及作家 Salman Rushdie)，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英國與美國民眾對於兩國政府在波士尼亞事件的處理上，抱持著批判的態度。④即便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說，也都是論述的一種並有其政治的效果，因爲它們以知識的形式，試圖「再現」全球政治空間的意義：⑤以「領土—主權—民族國家」作爲主要的政治生活單位、強調權力政治是國際關係的本質，並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或甚至爲特定國家的利益服務 (第四項)。將「地緣政治」的概念基進化 (radicalize) 的結果，

註①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p. 3.

註②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2nd edition), p. 6.

註③ 對於「外交政策」意涵的延伸與詮釋，參見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2nd edition).

註④ Klaus Dodds, “Enframing Bosnia: The Geopolitical Iconography of Steve Bell,”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70~197.

註⑤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34; Gearó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 6~7.

因而是在研究對象與範疇上的擴展。

由於在學科的分野上同時跨足地理學與國際關係，在思想的發展上更受到若干社會理論—女性主義、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綠色政治 (green politics)—的影響，批判性地緣政治是一個十足的跨領域途徑。³⁶以 Ó Tuathail, Dalby and Routledge 所編的讀本為例，³⁷其所收錄的文章不僅包括前述帝國與冷戰時期地緣政治的代表作，更進一步延伸到了經濟、文化、安全、環境、性別等面向。平心而論，此一跨領域的特質各有利弊：其好處在於，由於探討的許多議題，例如國家、疆界、內部／外部、再現、認同等等，往往也都是諸多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所關心的議題，批判性地緣政治可以與不同途徑相互對話與交流。舉例而言，以 Barry Buzan 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提出安全化理論 (securitization)，主張安全概念的基本邏輯是一個指涉對象 (國家、企業、環境、市場……) 內部的行為者，將某一議題呈現為存在性威脅 (existential threat)，從而需要採取非常手段。一項議題是否、或如何被安全化，並不能先驗的被決定，而須取決於行為者的話語行動 (speech act)。³⁸這顯示出哥本哈根學派對意義建構的強調，與批判性地緣政治對「再現」的重視，有異曲同工之妙。Buzan 等人不時以「戲劇」(drama) 的比喻說明一個議題的被安全化，亦與 Ó Tuathail 發展出的「腳本」、「故事情節」等概念相近 (參見下文)。儘管兩個學派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對話，但二者在理論層次上卻有相通之處，而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相對的，跨領域的特質也意謂學科邊界的模糊，不易與其他途徑作明顯的切割。除了特別強調空間意義的建構，以及以傳統的地緣政治為反省對象外，批判性地緣政治與其他批判理論並無太大的差別，其主張可以被其他途徑 (如後結構論述理論) 所吸收。

誠然，這並不是暗示批判性地緣政治沒有發展的價值。本文已在前言的部分，提及批判地緣政治在詮釋力方面可有的貢獻。進一步的討論，或許能由若干個案的對比凸顯。波士尼亞戰爭涉及人道危機與國際干預兩大議題，而常與其他個案如發生在科索沃 (Kosovo)、蘇丹、阿爾及利亞、盧安達等地的人道問題與衝突相提並論。美國對這些議題的態度及回應方式是明顯不同的：科索沃與波士尼亞在地理上相近，美國亦以族群仇恨、人道危機界定兩者，且均主張以空襲而非地面部隊作為介入的手段，但美國政府對於科索沃的干預，並沒有如同其在波士尼亞一案上的遲疑與保留，其早在 1992 年 4 月即已承認波士尼亞的獨立地位，卻直至 2008 年 2 月才承認科索沃；對於和波士尼亞約略發生於相同時間點的阿爾及利亞衝突與盧安達種族清洗，美國卻持不

註³⁶ 在英、美大學裡，從事政治地理學的多半是地理學者，政治地理學與批判性地緣政治的主要人物也多是地理學背景出身，並／或任教於地理學相關系所。參見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Introduction," p. 6. 因此，它在性質上較適合被定義為一個跨領域的學科，而不是國際關係裡的次領域。

註³⁷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註³⁸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pp. 23~26.

干預、甚至漠不關心的態度。^③如何解釋這些差異？首先，抽象的「理性」、「(國家)利益」等概念，並無法提供充足的解釋，因為若持「決策者是理性的」此一普遍性的假設，則它當適用於所有的個案上，而無法單獨說明這些政策上的差異或轉變。換言之，要解釋一個具體的政策做成，必須關注「脈絡」的重要性，因為不同的脈絡會賦予理性跟利益的考量不同的面貌。其次，重視脈絡或個案的特殊性，可以開展出不同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其各有利弊得失。一個常見的研究取向，是對行為者意圖與動機的分析，而屬認知心理學、各式政策分析模式等理論途徑、或是深度訪談、自傳、日記的分析等研究方法的範疇。這固然是合理 (legitimate) 的，卻不免有「如何知道其為真」的疑問空間。此外，探討行為者的意圖與動機雖然可以解釋政策是如何做成的，卻無法解釋它是否被接受、挑戰或否定。在資訊快速流通的民主社會裡，這個面向的解釋，當是十分重要的。

若將分析焦點從行為者身上移開，則從政策所涉及的言說或論述著手，是另一個可能的研究取向。批判性地緣政治關注地緣政治意義的建構，因此著重於議題與政策的「再現」，也就是關於「哪裡—地點說明」、「什麼—狀況描述」、「為何—因果關係的歸因/歸罪」、「誰—主角典型」以及「那又怎樣—利益宣告」等議題的一套論述。^④即使我們認為政治行為者提出的言說或論述僅是表面的辭藻，用來包裝其背後的選舉利益與聲望考量，這些言說或論述卻是政治活動的基礎，告訴人們一個政策將把他們帶往何處。在此意義下，論述或政策理性 (reasoning) 可視為政治力互動交鋒的場域：支持者加以捍衛之，懷疑或反對者則需指出其不合理之處，或以另一套方案代之。^⑤此一取向的研究，不必然否認選舉利益、理性決策等因素在政策過程中的作用，而亦有助於理性政策的制訂與轉變。當一套論述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或至少沒有受到過多挑戰，則一個政策是相對安定的；一旦時移勢易，既有的論述無法涵蓋新的現象，或其內部產生矛盾，則既有論述的安定性便受到挑戰，政策的調整或揚棄便成為可能。

以此來看，美國在上述個案的政策差異，是因其賦予這些地區不同的地緣政治意涵，故有不同的政策啟示。以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為例，相關研究指出，1990-1994 年間，美國六大報紙報導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的比例為 25 : 1，顯示美國媒體與政府對前者的關心遠大於後者。^⑥與前文提及，美國總統柯林頓在 1994 年 5 月針對兩地曾表達「美國不能成為世界警察」的態度相對照，則柯林頓的立場在波士尼亞的個案上，顯然有較大的轉折。在波士尼亞的衝突上，「波士尼亞」的地緣政治意義和「歐洲」相連

註③ Helle Malmvig,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Interventionary and Non-Interventionary Practices in Kosovo and Alger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Garth Myers, Thomas Klak, and Timothy Koehl, "The Inscription of Difference: News Coverage of the Conflicts in Rwanda and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5, No. 1 (1996), pp. 21-46.

註④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pp. 608-617.

註⑤ 這方面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見 Ole Wæver, "Explaining Europe by Decoding Discourses," pp. 106-110.

註⑥ Garth Myers, *et al.*, "The Inscription of Difference: News Coverage of the Conflicts in Rwanda and Bosnia."

結，從而有進一步與其他歷史記憶或概念相接合的可能。不論「波士尼亞」、「歐洲」是如何與其他概念或歷史記憶相連結（參見下文），這些連結都牽涉到美國或西方的自我認同，因此易受到媒體與公眾的關切。反之，媒體往往將盧安達的屠殺歸因成「黑暗非洲」與「部落文化」，顯示出儘管美國有相當比例的非洲裔人口，但至少在媒體的運作上，仍充斥著殖民主義的歧視態度。「忽略無視」的政策選項，因此沒有遭逢太大的質疑。

凡此皆意味著，一個地區或事件的地緣政治意義是浮動的。波士尼亞、盧安達、阿爾及利亞、科索沃等地區並不因其客觀上的人道危機而自動在美國外交政策享有地緣政治的意義，其意義是建構的、並隨時空脈絡而有不同。由此而來的推論是，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涉及到美國內部的歷史經驗與認知，而這些經驗與認同並不必然在其他事件上產生影響。因此在此個案上得出的結論，不能逕行引伸至其他個案或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通則，而必須累積更多實證研究，進行更仔細的檢證。^④

參、解讀波士尼亞戰爭

本節將討論批判性地緣政治對於波士尼亞戰爭的解讀，而分為兩部分進行。由於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發展係以傳統地緣政治作為批判與參照的對象，第一小節將著重於主流觀點的描述與其問題。第二小節則從論述的概念出發，提出美國在波士尼亞問題上的兩大回應方式，以及其所隱含的政策選項。該節並討論此一途徑與現實主義的差別。

一、傳統的解釋與問題

與 1990-1991 年在波斯灣戰爭中率領盟軍對抗伊拉克的態度相較，美國在波士尼亞的衝突過程中，一直表現出不願意積極介入的立場，直到 1995 年夏天才有所轉變。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布希與柯林頓政府皆毫無作為。舉例而言，布希政府支持聯合國對波士尼亞的人道援助（聯合國安理會第 761 號決議）、促成安理會針對塞爾維亞戰機的禁航令（聯合國安理會第 787 號決議）、並推動國際戰犯法庭的成立；柯林頓政府則除了延續前任的政策外，另推動波士尼亞「安全區」的設立（聯合國安理會第 824 號決議）、解除對波士尼亞回教徒的武器禁運、推動和平談判，並終於在 1995 年夏天支持

註④ 批判性地緣政治在這方面的知識積累尚不足夠。但以 Ole Waever 為首的若干北歐學者，以論述理論的途徑出發，嘗試藉由釐清不同歐洲社會對「國家」、「民族」、「人民」等概念的理解與相互關係，掌握其自我認同的建構以及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尤其表現在歐洲整合的議題上。這些成果固然不能、也不欲建立明確的因果關係或通則，但卻有助於理解一個國家大致的議題走向。這或是諸如批判性地緣政治等批判性途徑可以發展的方向。參見，Ole Waever, "Explaining Europe by Decoding Discourses"; Lene Hansen and Ole Wae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北約對波士尼亞境內塞爾維亞軍隊的空襲、促成 Dayton 和平協議的簽署，以及派遣 20000 名士兵以執行該和平協議。然而，兩任政府在戰爭進行的時期皆欠缺派遣地面部隊至波士尼亞的意志，而這使得塞爾維亞對其他兩族裔進行的殺戮、大規模強暴與驅逐，甚至「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或「大屠殺」(genocide) 無法有效受到遏止。「大屠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次出現於歐洲此一事實，對許多人來說是無可接受的。對其而言，波士尼亞戰爭意味的，是西方國家的「無能」、「困頓」與「缺乏意志的勝利」，甚至是個「失敗」。^④

如何解釋美國起先缺乏意志派遣地面部隊以履行各相關的聯合國決議、甚至是阻止大屠殺的發生？一個主流、也是代表美國官方說法的觀點，賦予了美國以及波士尼亞（或巴爾幹半島整體）特殊的地緣政治意義：首先，就美國而言，美國在波士尼亞並沒有重大利益；其次，波士尼亞衝突的起因與意義，牽涉到巴爾幹半島族群間長久的歷史仇恨。這兩個相關連的說法都各有其依據，但也都有可議之處，以下將分述之。

首先，針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內容，一個常被引述的宣稱是柯林頓總統在 1994 年 5 月 3 日對媒體的發言。其認為，關於發生於盧安達與波士尼亞的「人道危機擴散」，「美國不能解決每個問題，且必定不可成為世界警察」。^⑤相似的宣稱亦出現於其前任的布希政府。^⑥就傳統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巴爾幹半島在後冷戰時期不再是美國重要利益之所在，是很合理的。冷戰期間，美國的戰略承諾、地緣政治利益與道德義務，因為有明確的假想敵之故，是相對清楚的。中南美、加勒比海地區、西歐、部分亞洲國家如日、韓、(台灣)等，在美國的戰略地圖上，享有「地緣政治的鄰近性」(geopolitical proximity)，亦即美國對這些地區的安全較有承諾。^⑦相對的，這些地區以外的區域，在其戰略地圖上即較為遙遠。前南斯拉夫聯邦由於其所持之「不結盟政策」，因而自外於前蘇聯在東歐構築的安全體系之故，對美國及西歐國家而言，是一個顯著的地緣政治身分。^⑧在後冷戰時期，由於缺乏一個明確的競爭對象，美國戰略地理上「鄰近」與「遙遠」的區隔，即變得不明確且分散。其結果，巴爾幹半島包括波士尼亞在內，不再成為美國重要利益之所在。1993 年當時的國務卿 Warren Christopher 即表示，波士尼亞「牽涉到我們【美國】的人道考量，但它並不涉及我們的重大利益」。^⑨隨著冷戰體系的瓦解，巴爾幹半島即失去了其曾有的地緣政治地位。

然而，在客觀形勢上或傳統地緣政治意義下，波士尼亞不再是美國國家利益的觀

註④ Karin Fierke, "Multiple Identities, Interfacing Gam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Action in Bosn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4 (1996), pp. 467-497;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註⑤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 188.

註⑥ 周煦，「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上）」，*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1 期（1995 年 11 月），頁 7。

註⑦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 188.

註⑧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pp. 23-25; Gearóid Ó Tuathail, "A Strategic Sign," p. 515.

註⑨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p. 51.

點，卻有其不足之處。最大的困境在於，此說很難解釋美國何以終究關注一個沒有戰略地位的遙遠地區、促成當地的和平協議，並派兵進入當地以確保協議的履行。其他可能的解釋，諸如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府會關係、^⑤機構因素、領導人物的個人特質與美國的對外關係等，^⑥或可提供可能的解答，但卻不免偏離了「地緣政治」的層次，與發生在相近時間點、性質相似的盧安達兩相對照，則這些解釋項更顯不足。如下文（第二節）將指出，從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角度觀之，美國態度的轉變，正顯示出空間意義的建構性。換言之，美國政策的改變，或可從其地緣政治思想中，兩股交錯的論述或「腳本」之相對關係來理解。

進一步來看，美國不願積極介入的原因，是主張波士尼亞的衝突源於族群間長久的歷史仇恨，而正因如此，外國政府無法、也無須介入。這個說法不僅見諸於美國官方、媒體，也為學者所採納。例如，柯林頓總統在 1993 年的就職演說中提到，這個世界「仍然受到古老的仇恨與新的瘟疫之威脅」；同年 4 月，國務卿 Warren Christopher 描述波士尼亞境內三個族群間的仇恨時，指出「【仇恨】幾乎是不可置信的。它幾乎是駭人的，它已歷數世紀之久……它是來自地獄的麻煩」；^⑦媒體如 *New York Times* 曾以「古老部族的對抗」為標題描述巴爾幹半島的衝突。^⑧其所描繪的圖像因而是，巴爾幹半島是一個充滿仇恨與戰亂的「鍋子」，族群間原始不可解的衝突在冷戰的氛圍裡被壓抑。隨著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這個「蓋子」被拿開，而鍋裡的古老與自然仇恨隨即快速沸騰。^⑨新現實主義者 John Mearsheimer 亦主張，波士尼亞的和平之道，在於將之劃分為三個領域，分別由回教徒、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聚居。^⑩儘管他並沒有提到歷史的仇恨，但隱含的假設—領土與族群的界線必須一致，才能避免衝突繼續發生—實已將族群間的差異（遑論仇恨）視為本質的與不可變動的。最後，就實際的政策面來看，不論是 1993 年的 Vance-Owen 和平計畫，或是 Dayton 和約的設計，也是基於「族群」的地緣政治想像—這三個族群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分而治之。^⑪

將巴爾幹半島上的人們建構為暴力的、部族的、仇恨的與落伍的，有其特定的論述效果。在時間面向上，此一負面的建構暗示著這些他者無法突破既有的模式，他們無法朝著以西方為代表的文明演進；在空間面向上，則賦予了巴爾幹地區一個共同的身分建構和地緣政治意涵：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與克羅埃西亞三大族群都有不理

註⑤ 李瓊莉，「美國出兵波士尼亞與其府會戰爭權之爭」，*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2 期（1996 年 2 月），頁 33~44。

註⑥ 周煦，「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下）」，*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2 期（1996 年 12 月），頁 33~60。

註⑦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93.

註⑧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91.

註⑨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Discourses of War: Security and the Case of Yugoslavia,"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163.

註⑩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1993.

註⑪ Bridget Robinson, "Putting Bosnia in Its Place," p. 396.

性、不文明的本質，他們因而皆是可責的，儘管在程度上或有不同。由此而來的政策啓示因而是：西方國家既沒有實際上的能力也沒有道德上的義務介入該地並終止戰爭。^{⑤⑦}此一歸因從而給予了西方國家不（積極）作為的正當性。

然而這樣的解讀，在事實層次上並非毫無疑問。首先，就歷史的角度來看，將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與文化以負面的字眼表述，其實是個相對晚近、約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轉折與建構。^{⑤⑧}其次，族群歷史仇恨的說法對於波士尼亞居民的生命經驗來說，或許是很難理解的。David Campbell 即以自己的實地走訪經驗指出，不論在戰爭爆發之前或期間，多元族群的經驗一直都存在；^{⑤⑨}其他觀察者亦指出，族群間彼此通婚、共同生活與工作的現象，在當地已有數十年的經驗。^{⑥⑩}第三，衝突的起因可以有社會與經濟面向的解釋，而無須訴諸本質性的族群特質。一位觀察家指出，「巴爾幹的衝突並不是歷史仇恨的結果，也不是回歸到共產主義之前的過去；它是將社會主義社會轉型到市場經濟與民主的結果。導致這個失敗的重要元素之一，是經濟的惡化，而後者主要肇因於解除外債危機的努力。超過十年的緊縮與生活水準的下降，侵蝕了社會網絡以及個人與家庭倚賴的權利與安全」。^{⑥⑪}無論此一見解是否成立，或是否能推及至其他地區如科索沃的衝突，它都暗示著其他政治性而非本質性的解釋是可能且存在的。此外，相同的歷史事實也可以用不同詞彙表述，而每一個詞彙所隱含的政治與道德意義皆不同。除了「族群仇恨」，美國政治圈裡也曾以「內戰」、「侵略」、「對世界秩序的破壞」等不同概念理解與詮釋波士尼亞戰爭，但或因它們意味著國際社會更大的干預責任之故，並未如「歷史仇恨」說般，被廣泛、系統性的採用。^{⑥⑫}

這些反事實與見解的存在，暗示著歷史仇恨的歸因是一個建構的結果，是多種可能詮釋的一種。政府、媒體與學者的採納，因而有其政治效果。

在此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第一，這些反事實的存在，絕不意味著族群仇恨是不存在或是虛構的；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而言，族群間的歷史仇恨當然是真實而具體的。反事實的意義，不是在評判哪些事實是真實的或虛假的，而是提醒我們事實的複雜性，並暗示著不同的事實將會開展出對於波士尼亞戰爭的成因與政策選項的不同認知。^{⑥⑬}第二，前述政府、媒體與學者「採納」一套觀點而非其他，並不必然是有意識的

註⑤⑦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p. 96;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Discourses of War," p. 150; Riikka Kuusisto, "Framing the Wars in the Gulf and in Bosnia."

註⑤⑧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p. 105.

註⑤⑨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pp. 1~3.

註⑥⑩ Beverly Crawford, "Explaining Cultural Conflict in Ex-Yugoslavia," p. 197; James Petras and Steve Vieux, "Bosnia and the Revival of US Hegemony," *New Left Review*, Vol. 218 (1996), p. 9.

註⑥⑪ Susan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 15.

註⑥⑫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Discourses of War."

註⑥⑬ 由此引伸的一個議題是，批判性地緣政治或是廣義的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是否能就波士尼亞戰爭提出不同的見解。政治制度的設計、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甚至認同政治的發展等等，都是可能的觀察面向。唯這方面因為既有的文獻尚稱不足，加上本文的重點主要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僅能留待日後以另文處理。

作為。在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緣政治的技術如何形塑我們對國際政治的理解，有其必要。Campbell 指出，儘管不同的政治勢力、媒體與學界對波士尼亞的「敘事」皆不同，但它們在形式上卻有共通之處。⁶⁴首先，這些敘事通常都包含了一幅南斯拉夫聯邦的地圖，其上描繪各共和國的邊界及其首都；其次它們經常提供了在重大歷史時刻裡，南斯拉夫人口的統計調查，以及其間的族群比例；最後，它們亦含括了一套歷史回顧，暗示著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這些看似再正常不過的實踐，卻有著刻畫，甚至生產民族與族群概念的功用：地圖是人們認知、言說與建構人文世界的方式之一，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有密切的關連；⁶⁵人口的普查與統計，能劃分群體、建立身分；而一套歷史演進的詮釋，則有正常化、合理化現狀的功能，因為透過歷史的陳述，發生於現在的事件似乎都能在過去裡找到原因。由此觀之，政府、媒體與學者對波士尼亞戰爭的分析角度，不必然有意識的選擇，而可能已隱含在對波士尼亞「基本事實」的掌握上。⁶⁶

二、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解讀

以上的討論，旨在說明主流的觀點—1. 美國不積極介入，是因為客觀而言它在波士尼亞沒有重大利益；2. 波士尼亞戰爭起源於族群間的歷史仇恨—並不是毫無疑問的。前者將問題轉向意義的建構，後者則指出，主流的建構並非唯一，而有其政治效果。在問題化這兩項觀點之後，批判性地緣政治亦對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提出自己的詮釋。此一詮釋的途徑，並不將重點擺在特定的人或組織，而是關注在結構面向上美國地緣政治的思路（reasoning）。每一套思路、論述或腳本，同時涉及了美國對波士尼亞的定位，以及相應的立場與政策選項。美國政策的變遷，可由不同論述或腳本間的相對關係來解釋。

美國（以及英國與法國）的態度在為期三年多的波士尼亞戰爭裡，是不明確與模糊的。對於發生在當地的慘劇與「人道危機」，西方政治領袖經常擺盪於「我們無法做什麼實質的事」以及「我們可以、也必須多做些什麼」的立場，對於衝突的成因以及西方國家應有的行動，也有不同的解讀。⁶⁷ Ó Tuathail 認為，美國對波士尼亞衝突的詮釋，大抵可區分為兩個主要腳本（script），而兩者皆能用「再也不發生」（never again）這個標語表示。⁶⁸這兩個腳本因此代表了美國波士尼亞論述的兩大原型（prototypes）。

「再也不發生」的第一個意思，是指美國不能容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對猶

註⁶⁴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pp. 78~80.

註⁶⁵ 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170~178.

註⁶⁶ 由此而來的申論是，當討論意義的建構時，「作者」與起因的追求便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都可能有意無意複製或再生產特定的觀點。當然，儘管不是「作者」，國家機器與媒體的實踐，會因為他們掌握的資源與影響力，而比其他實踐更具重要性。

註⁶⁷ Riikka Kuusisto, "Framing the Wars in the Gulf and in Bosnia," p. 610 n.8.

註⁶⁸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 192.

太人的大屠殺 (holocaust) 再度發生。Bridget Robinson 研究英國媒體如何再現波士尼亞的論文指出，^⑥英國媒體一方面強調巴爾幹位於歐洲，「巴爾幹人就像我們 (歐洲人) 一樣」，從而表達出對波士尼亞衝突的關懷，儘管另一方面卻也傾向將衝突的起源歸因於族群野蠻、不理性、落後的本質，而暗示著英國政府與人民的無能為力。此一論述策略賦予波士尼亞一個「歐洲」的地緣政治意義，從而立即開啓了一連串和歐洲歷史經驗以及西方世界自我認同相連結的可能性。塞爾維亞人的「種族清洗」因此可被類比為二次大戰期間的種族滅絕，而故事裡的各個主體的關係隨之相對明顯：納粹 vs. 猶太人、塞爾維亞 vs. 波士尼亞克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加害者 vs. 受害者、善良 vs. 邪惡，這幾組二元對立可以輕易地被連結起來。此一策略的優勢在於，將某一局勢定義為「種族滅絕」，則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罪公約」的締約國將負有防止或懲戒的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儘管該公約沒有對種族滅絕下清楚的界定，使得議題往往流於辯論一個情勢是否為種族滅絕，但此一討論本身即已帶有該情事並非一般戰爭的可能性，從而有強烈的道德與責任意涵。在這些二元對立中，能區隔出明顯的是非對錯，以文明、人權等價值自況的美國 (以及歐體) 因而扮演了應受譴責的旁觀者角色。由此而來的政策啓示則是：美國 (或廣義的西方) 負有積極介入種族清洗戰爭的道德義務。^⑦

「再也不發生」的第二個意思，則是指美國再也不能重蹈昔日越南的覆轍，身陷在一個邊緣地區的內戰裡。這個觀點包含兩個層面：首先，在事件的解釋上，採取前述的「族群古老仇恨說」，將衝突歸因於無法解釋、也不用解釋的本質性因素，從而免除美國介入的義務。「波士尼亞」位於「歐洲」的意義，也能進一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相連。曾任布希政府時代國務卿的 James Baker 於 1995 年撰文寫到，「1914 年，發生在一個不重要國家的單一事件—奧匈帝國王子 Ferdinand 於賽拉耶佛遇刺—擴散成為大陸的衝突；今天，較為次要但相似的危機，仍然存在」，提醒人們介入可能會有的反效果。^⑧

在軍事或實際行動方面，波士尼亞則被比擬為另一個越南，是一個危險的軍事「泥沼」(quagmire)。^⑨「越南化」的論述在 1990 年年終出現，其背景則是以塞爾維亞裔為主體的南斯拉夫人民軍 (JNA) 轟炸克羅埃西亞境內具歷史意義的港口 Dubrovnik，引發國際關切。^⑩當時美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 Warren Zimmermann 將美國政策識別為「越南症候群」以及「鮑威爾準則」。前者以副國務卿 Lawrence

註⑥ Bridget Robinson, "Putting Bosnia in its Place: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snia in the British Print Media," *Geopolitics*, Vol. 9, No. 2 (Summer 2004), pp. 378-401.

註⑦ Gearóid Ó Tuathail, *op. cit.*, p. 193.

註⑧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p. 108.

註⑨ Gearóid Ó Tuathail, *op. cit.*, p. 192. Kuusisto 亦觀察到此類「沼澤」(quagmire, morass, swamp, marsh, quicksand) 隱喻的使用與效果：陷入沼澤時溺斃、窒息、痛苦的意象，暗示著雖然救人的意圖是高尚的，救援者 (即西方國家) 卻可能面臨臨進自身安全的不測，因此必須對干預持戒慎恐懼、甚至是保留的態度。Riikka Kuusisto, "Framing the Wars in the Gulf and in Bosnia," p. 617.

註⑩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p. 56.

Eagleburger 以及國家安全顧問 Brent Scowcroft 為代表，因為二者開始以「泥沼」形容南斯拉夫。後者則是由鮑威爾將軍於波灣戰爭中提出，主張美國應避免軍事介入一個自始任務內容、軍事目標以及退出策略均不明的情境；若美國欲使用其軍力，則應以其優勢力量確保快速與簡單的勝利。由於波士尼亞是個族群間的衝突，難以解決，因此簡單快速的軍事行動勢不可得。兩相結合，其要旨則為：因為波士尼亞戰爭的本質是源於歷史不可解的仇恨，對美國來說它是另一個越南、另一個會使美國身陷進退不能窘境的地區，美國因此最好不要介入。

這兩個論述構成了美國在看待波士尼亞時的主要方式：主流的觀點都在這兩種「理想型」(ideal-type) 之間擺盪。^④這是說，布希與柯林頓兩任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與軍方—大致是採取第二種立場，儘管他們的言論不時會有偏向第一種立場的態勢。相對的，媒體以及美國政府內部的中階外交官員，或因為皆大量接觸發生在波士尼亞的悲劇之故，較容易援引或呼應第一種論述。

以布希政府而言，面對日益明顯的塞爾維亞戰爭行為，其僅以對南斯拉夫全境的武器禁運及經濟制裁回應。即使美國於 1991 年繼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之後，承認克羅埃西亞與斯洛文尼亞的獨立地位，並於 1992 年 4 月承認波士尼亞，美國卻缺乏保護它們的意願。^⑤在 1992 年 8 月的談話中，布希總統先是宣稱侵略者與極端份子追求「族群清洗的不道德政策」，但隨之將衝突定義為「由長久仇恨發展出來的複雜難解衝突。無辜者的血液被噴灑在數世紀的敵對上，敵我的界線混亂且脆弱」，因此解決之道無法一蹴可幾，「任何長遠的解答只能由衝突各方自己的積極合作與參與中找出」。美國能採取的對策，首要是確保人道救援物資的遞送，其後則是對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與波士尼亞的外交承認、對塞爾維亞的政治與經濟孤立、預防性外交以防止人道危機擴散、加強與北約盟友的諮商等等。至於對記者關於是否將動員美國軍事人員，答案則是明確的「否」。^⑥這段談話中可以看出，布希政府固然承認波士尼亞衝突已是「族群清洗」，但仍盡力豁免自己的政治與道德責任，而將解決之道歸於衝突各方，暗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責的。

隨著衝突的日益加劇，以及媒體關於集體強暴、屠殺與集中營的揭露，將波士尼亞與種族屠殺相連結的論述開始於 1992 年出現。然而，由於不願直接介入，美國政府高層的態度仍將波士尼亞的戰爭歸因為上述的歷史仇恨。面對媒體的批判，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撰文回應。^⑦他首先強調美國並非不使用武力，而表現在諸

註④ Lene Hansen 檢視美國與英國在波士尼亞議題的辯論，整理出「巴爾幹論述」與「種族清洗論述」兩大觀點，和 Ó Tuathail「越南化」與「大屠殺」的分法相似。唯「越南化」的論述不僅能含括「巴爾幹論述」的歷史解釋，越戰的經驗與類比更是美國特有的歷史記憶，更能貼近美國的內部的觀點，故本文在此從 Ó Tuathail 的用法。可參考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pp. 95~114.

註⑤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p. 198~201.

註⑥ George H. W. Bush,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Bosnia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in Colorado Spring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6 August 1992), pp. 1315~1318. [Online] <http://www.gpoaccess.gov/pubpapers/search.html> [Accessed 30 Dec 2009].

註⑦ Colin Powell, "Why Generals Get Nervo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92.

如巴拿馬、菲律賓、賴比瑞亞、索馬利亞等地的軍事行動與波灣戰爭。這些行動之所以成功而不致成為另一個 1961 年豬灣事件、1983 年貝魯特轟炸或另一個越南，在於有明確的政治目標。相形之下，波士尼亞的危機「非常複雜」，美國與國際社會的目標在於提供人道援助，因為該地的問題「源於千年來的族群與宗教本源」。其解決之道因而只能是政治的，任何超過人道援助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十分小心，且需先全面檢驗所有的可能性。此一論述策略看似正常不過，卻建構出了特定的效果：將波士尼亞戰爭定義為「非常複雜」，^⑧呈現出一幅泥濘、模糊不清的圖像；而「古老族群仇恨」或「族群」的歸因，更暗示著在當地「好人跟壞人」或「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區隔是不明顯的。^⑨前者透露出美國的軍事行動很可能是另一個失敗與恥辱（例如越南），而後者更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美國（甚至國際社群）積極介入的道德必要，僅需人道上的救助即可。

從論述的角度觀察，繼布希之後的柯林頓政府，其外交政策基本上接受了「泥沼」的論述。儘管論者指出，柯林頓政府的立場常是搖擺反覆，甚至是矛盾的。^⑩柯林頓在 1993 年的談話指出，美國介入和平談判是必須的，若否，則「族群清洗的可怕原則受到合法化，一個族群將能在後冷戰時期殘害另一個族群，如果它夠強大的話」，似乎表現出往「大屠殺」論述發展的傾向，而願意賦予美國自身某種程度的道德責任。但他隨即將波士尼亞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連結，「不要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在這個地區並不是意外，那裡有古老的族群仇恨吞食著人們並導致可怕的凌虐」，又將責任推卸給衝突的他者。^⑪因此雖然在實際的政策上，柯林頓政府有若干作為，例如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在波士尼亞設立若干「安全區域」、空投人道救援物資給波士尼亞回教徒聚集區、支持禁航區的設置與執行等，但是其底線總是拒絕派遣地面部隊。從論述的角度來看，柯林頓政府的立場與其前任布希政府並無太大的差別：最終它仍是往越南化的論述靠攏。1993 年 4 月 30 日，柯林頓政府高層召開會議以討論其波士尼亞政策，根據記者引述，一位高層在總結決議時指出，「基本的策略是，這件事【波士尼亞戰爭】不會有贏家，它將變成一個泥沼。讓我們不要把它變成自己的泥沼。這就是解除【針對波士尼亞克人】的武器禁運，以及有限的空襲【塞裔軍事地點】的意義」。^⑫

試圖將波士尼亞的空間意義定為一個令人束手無策、並解除國際社會干預義務的泥沼，自然不會是毫無爭議的。首先，美國自 1989 年波灣戰爭以來宣示的「新世界秩

註^⑧ 將波士尼亞衝突描述成「非常複雜」，從而拒絕進一步分析或做出明確政策的策略，不僅出現於鮑威爾的文章。New York Times (6 May 1992) 即曾點名批判若干布希政府官員及歐盟代表以「太過複雜」為由而不作為。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p. 615.

註^⑨ Bridget Robinson, "Putting Bosnia in Its Place," p. 395.

註^⑩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pp. 208-222; 鄭端耀, 「美國柯林頓政府的波士尼亞政策」, 問題與研究, 第 32 卷第 11 期 (1993 年 11 月), 頁 9-22。

註^⑪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at A Town Meeting in Detroit,"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10 February 1993), pp. 73-85. [Online] <http://www.gpoaccess.gov/pubpapers/search.html> [Accessed 30 Dec 2009].

註^⑫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 211.

序」，在波士尼亞戰爭中遭到嚴重的質疑。如何一方面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另一方面保持「盡責的世界強權」形象，就成了美國政府的難題。⁸³將問題視為「人道危機」，並提供人道援助，雖然看似是個合理的選項，但是卻也留下「是否可以做的更多」的批判空間。其次，波士尼亞或整個巴爾幹半島的意義，在本質上是不安定而可以流動的。除了「泥沼」之外，它亦是歐洲的一部分，是許多西歐人民選擇度假的地點之一。一位論者曾在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指出，「這不是一個亞洲或非洲戰爭—血腥但位於遙遠地球的另一邊。它發生在我們去度假之處，這應該是個密切相關的經驗」。⁸⁴將「波士尼亞」與「歐洲」相連結的可能性，使得它一方面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於巴爾幹的歷史記憶相呼應，但也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種族清洗」、「大屠殺」、「集中營」等歷史記憶相結合。因為如此，而有了第二種的「再也不發生」論述出現的可能。

與「泥沼」論述相對的，是所謂的「大屠殺」論述，將波士尼亞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猶太人連結。此一論述在媒體、美國政府中階官員，乃至於部分國會議員間受到支持。1993 年一位國會議員在總結眾議院的政策辯論時宣稱，「人們尚在試著找出【波士尼亞】是 1942 年的德國或是 1975 年的越南」，⁸⁵體現出國會裡不同於政府觀點的存在。此外，媒體所呈現的文字、照片與影像、記者或評論人對政府政策的評析、各式專題報導與紀錄片，以及傳媒 24 小時的播放等媒介，使人們得以即時接收在波士尼亞所發生的種種屠殺、血腥與流離失所，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意見。1993、94 年間的美國民意調查發現，儘管有高達 60% 的民意反對美國單邊行動，但至少有成以上的民眾支持美國以多邊的形式進行干預，⁸⁶反映了民意在擔心美軍深入泥沼以及期盼恢復波士尼亞和平之間的擺盪。隨著大規模屠殺、破壞、流離失所等情事的持續披露，「波士尼亞」慢慢成爲一個象徵美國、北約與歐體／歐盟失敗的符號，給予西方國家領導者更大的壓力。1995 年 11 月 27 日，柯林頓總統針對派遣美軍以執行 Dayton 和約一事指出，美國的領導地位對於在後冷戰時期遏止或防止戰爭與民間暴力更形重要，「在這個新時代仍有時候美國—也只有美國—能夠且應該爲和平做出貢獻。在波士尼亞的可怕戰爭就是一例」。⁸⁷與其早先所言「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的言論對照，可說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此一轉變，很難以傳統地緣政治的理論來解釋，因爲所謂的「客觀」地緣政治條件—美國在波士尼亞沒有重大國家利益—並未產生改變；在官方「歷史仇恨說」的定調亦未有調整的情況下，一個合理的詮釋因而是，「大屠殺」的論述在相當程度上挑戰了美國政府的消極立場，指出此一立場在道德與責任上的不足。維繫美國作爲一個世

註⁸³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p. 620.

註⁸⁴ Hugo Young, "When Leadership Fails in the Face of Hitlerism," *the Guardian*, 15 April 1993. Cited in Bridget Robinson, "Putting Bosnia in Its Place," pp. 387-388.

註⁸⁵ Gearóid Ó Tuathail,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p. 211.

註⁸⁶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pp. 215-216.

註⁸⁷ Gearóid Ó Tuathail, "A Strategic Sign," p. 526.

界強權、領導者與普世價值守護者的形象，反而成為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⁸⁸

然而這並不是說，媒體因為採取或傳遞了大屠殺的論述，而在因果關係上導致了美國政策的轉變。嚴格來說，「大屠殺」論述對於美國政策轉向的影響程度，是不明確的。一方面，此一論述似乎有打動決策者或高階官員的效果。1992年4、5月間，波士尼亞外交部長 Haris Silajdzic 訪問華盛頓。據報導指出，他與國務卿 James Baker 的談話深深打動後者，是其「擔任國務卿以來最令人感動 (emotional) 的會面之一」。Silajdzic 隨後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 (National Press Club) 的演講，更將波士尼亞衝突與「歐洲」、「二次大戰」、「大屠殺」相連結，成為「大屠殺」論述的基石。⁸⁹然而另一方面，媒體研究卻也指出，儘管不容否認的，少數媒體從業人員能利用其工作經驗與機會，對閱聽人指出某些事物安排的不合理性，但所謂的「CNN 效應」—二十四小時連續播送的媒體能對國家政策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在因果關係上是可議的，亦即尚無實際的證據指出媒體能直接影響政策的轉變。⁹⁰因為有這正反兩方的線索，在評估媒體與大屠殺論述對政策的影響時，需要進一步、更謹慎的討論。

就媒體的角色而言，平心而論，無論是「越南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或其他歷史記憶，都早已存在並流通於美國社會，它們之所以會形成人們討論外交政策或公共議題時的資源，是人為建構或接合的 (articulate) 的結果，而這種種實踐，並不專屬於媒體的權力，也不需要透過媒體。就此意義而言，很難賦予媒體一個意義建構者的角色；它的重要性，毋寧在於它 (和其他建制如國家機器) 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可以凸顯某些觀點而非其他。前述 (第貳節) 批判性地緣政治對「通俗的地緣政治」的興趣，正是因為透過媒體，既有的地緣政治意義能夠被質疑、轉化甚至替代。「大屠殺」的腳本經由媒體的傳播，不斷挑戰了美國高層政治所持「泥沼」說的安定性。因此，媒體的意義與重要性，或許並不在它對於政策制訂的直接影響，因為這方面的因果關係尚未被證實，或許也不能被證實 (試問，有多少決策者會承認受媒體影響，是「媒體治國」?)，而在於它提供了讓特定地緣政治意義發展或受到爭論的空間。

就兩個論述之間的關係而言，美國對波士尼亞的政策，可說是以「泥沼」說為主軸，但持續受到「大屠殺」論述的挑戰。這並不是說兩個論述的界線是涇渭分明的，而毋寧是意指波士尼亞的地緣政治意義，有相當的模糊性，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建構。前述布希與柯林頓總統的談話即顯示出，波士尼亞可以被建構為既是一個需要美國干預的族群清洗問題，也是一個外人難以置喙的歷史仇恨。因為如此，相對應的政策立場與選項，就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就此而言，「大屠殺」的論述，在在凸顯「越南化」說法的限制，從而為政策的轉變提供了可能的條件：使得柯林頓政府決定

註⁸⁸ *Ibid.*

註⁸⁹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pp. 617-618.

註⁹⁰ 著名的例子有：因為使波境塞爾維亞人的集中營與種族清洗曝光而獲得 1993 年普利茲獎的 Roy Guttman、CNN 的通訊記者 Christiane Amanpour、BBC 新聞工作者以及暢銷書 *The Fall of Yugoslavia* 作者 Misha Glenny 等。參見 Gearóid Ó Tuathail, "A Strategic Sign," pp. 528-530。

更積極的介入波士尼亞的和平協議時，不至於使決策圈、軍隊、人民或其他國家感到突兀與無法想像。James Gow 所言，「波士尼亞是足夠接近而不能被忽略，以及不夠接近以致於不能被全心處理的現代邊境」，^⑩為波士尼亞矛盾的地緣政治意義，下了一個精闢的註腳。

從前面的討論裡，一個可能的問題是，批判性地緣政治的分析對國際關係而言並沒有帶來特別新的見解，它反而可能加強了現實主義的看法。舉例而言，Stephen Krasner 提出的「組織性偽善」(organized hypocrisy) 概念，^⑪主張主權是一個不穩定的建構，會因為國家權力和利益而被違背或屈從。由此引伸，我們亦可說，國際秩序或人道關懷亦不過是「組織性偽善」的一種，因此波士尼亞的地緣政治意義是隨著大國（尤其是美國）的權力和利益而定。美國可以因為自己不願意冒著另一個越戰的風險，而忽視發生在波士尼亞的種族清洗，將之定義為族群間千百年來的歷史仇恨，而證成自己的被動。對此，本文認為可由兩個面向加以探討。

首先，現實主義的主張，有過於強調國家或高層政治的能動性與權力之虞。它不僅忽略了不論國內外，對任一個事件或符號都可能不同論述的事實，也預設了政府或政治領袖能單方面賦予意義、界定事實的能力。儘管在前述的討論裡，主張波士尼亞是「大屠殺」的論述很難說成功取代了官方所持的「泥沼」說，但不同腳本並存的事實，即暗示著國家對於知識（符號、事件或空間的意義）的掌握，並不如現實主義者所假設的全面。

其次，並與第一點相關的，是政策合理性的可能條件。一個政策選項之所以能推動，一個基本要件是它的合理性不受質疑，而這意味著在社會上已有類似的論述或價值觀存在，並至少受到相當比例的大眾接受。政治理論家 Ernesto Laclau 在研究民粹主義時，^⑫指出大部分的文獻皆把民粹運動的成功，歸因於領袖的「操弄」。儘管「操弄」確實可能存在，但這僅能解釋該領袖的動機，並無法充分解釋為何特定的操弄會（或不會）成功。因此，進一步追問操弄所包含的社會關係，是有必要的。以此來看，美國消極政策的採納，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一方面呼應、一方面運用了「越戰」此一歷史記憶作為合理化的基礎。相對的，對於二次大戰納粹的記憶，也是媒體報導等「通俗的地緣政治」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因此，儘管就表面上來看，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看法似乎確認了「西方」的權力能力，從而強化了現實主義的論述，但二者之間所開展出來的、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與外交政策的分析，卻是大不相同的。對於國內的論述作比較詳盡的探討，將有助於理解該國外交政策可能的走向。

註⑩ James Gow,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p. 328.

註⑪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⑫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 99.

肆、結 論

批判性地緣政治是橫跨政治地理學與國際關係的一個次領域。受到兩個學門內部後現代思潮或廣義的建構論影響，批判性地緣政治在認識論上持廣義建構論的立場，旨在探討全球政治空間的建構。與傳統地緣政治不同，它並不主張能發現地理條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科學關係，因而不提供國家在戰略上應採的政策手段。相反的，它將地緣政治的學說理解為一套論述，而後者具體落實在政府、官僚機構、學界、媒體與通俗文化作品等各式場域。批判性地緣政治的研究對象與方式，因而是多元而鬆散的。

從「全球政治空間的建構」此一前提出發，美國對波士尼亞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就是賦予「波士尼亞」此一概念或符號特定的政治意涵。「泥沼」說將波國與美國的越戰經驗相連結，由此可得的政策選項，是消極的，體現在布希與柯林頓兩任政府拒絕派遣地面部隊製造和平。相對的，「大屠殺」說將波士尼亞與二次大戰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相連結，從而隱含了美國需積極介入，不讓歷史重蹈覆轍的道德責任。儘管「大屠殺」說並未能真正成功挑戰或取代「泥沼」說，它卻經由現代傳媒科技的媒介，影響甚或塑造了美國民意。「波士尼亞」所代表的，再也不是一個座落於歐洲邊陲的遙遠小國，而是直接與美國近代歷史經驗的兩個因素－納粹德國與越戰－產生關聯。它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的象徵意義，因此大於它實際的、傳統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這樣的研究途徑，將國際關係研究的焦點轉向國內的論述結構。儘管就表象來看，論述的建構似乎仍反映了權力政治的有效性，但是探討一國在特定議題上所涉及的主要論述，能幫助我們掌握一個國家的歷史經驗、社會情勢與自我認同，從而對於可能的政策產出，有更細緻的理解。

* * *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e Case of USA's Bosnia Policy

Jyun-yi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approach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to study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ith the Bosnian war (1992-1995) being the empirical case. Influenced by the stream of post-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critical geopolitics aims at problematizing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thinking, holding that the meaning of concepts such as sovereignty, territory, boundary, nation-state, and so on, is not given and fixed, but is a construct of social practices. One function of foreign policy is thus to give an "Other" a specific geopolitical meaning, thereby constructing or rationalizing possible policy options. Upon this basis,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US government eventually intervened actively in Bosnia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a shift in discourse in the sense that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ancient hatred and ethnic conflict had gradually been challenged (although not replaced) by another discourse of holocaust. While such research approach may seem to confirm the power of the West in determining facts and actions needed, and therefore reinforce the claim of realism,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ory-building, and i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Critical Geopolitics,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e Bosnian war

參考文獻

- 李瓊莉，「美國出兵波士尼亞與其府會戰爭權之爭」，*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2 期（1996 年 2 月），頁 33-44。
- 周煦，「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上）」，*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1 期（1995 年 11 月），頁 4-17。
- 周煦，「美國的波士尼亞政策（下）」，*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2 期（1996 年 12 月），頁 33-60。
-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 2 期（2008 年 6 月），頁 57-85。
- 鄭端耀，「美國柯林頓政府的波士尼亞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11 期（1993 年 11 月），頁 9-22。
- Agnew, John,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Gearóid Ó Tuathail), "Introduction,"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1-9.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2nd edition).
- Bush, George H. W.,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Bosnia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in Colorado Spring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August 6, 1992), pp. 1315-1318. [Online] <http://www.gpoaccess.gov/pubpapers/search.html> [Accessed 30 Dec. 2009].
- Buzan, Barry,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 Campbell, David,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Campbell, David,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2nd edition).
- Castree, Noel, "The Geopolitics of Nature,"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423-439.
- Clinton, William J., "Remarks at A Town Meeting in Detroit,"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Feb. 10, 1993), pp. 73-85. [Online] <http://www.gpoaccess.gov/pubpapers/search.html> [Accessed 30 Dec. 2009].
- Crawford, Beverly, "Explaining Cultural Conflict in Ex-Yugoslavia: Institutional Weakness, Economic Crisi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eds., *The Myth of Ethnic Conflict*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8), pp. 197-260.

- Crawford, Beverly and Ronnie D. Lipschutz, "Discourses of War: Security and the Case of Yugoslavia,"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149~185.
- Deudney, Daniel, "Geopolitics as Theory: Historical Security Materi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0), pp. 77~107.
- Dodds, Klaus, "Enframing Bosnia: The Geopolitical Iconography of Steve Bell,"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70~197.
- Dodds, Klau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0).
- Dodds, Klaus,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2001), pp. 469~484.
- Dodds, Klaus, "Cold War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210~211.
- Doty, Roxanne,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 Post-Positivist Analysis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3), pp. 297~320.
- Fierke, Karin "Multiple Identities, Interfacing Gam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Action in Bosn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4 (1996), pp. 467~497.
- Flint, Colin, *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 Gow, James, *Triumph of the Lack of Will: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Yugoslav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ansen, Lene,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 Hansen, Lene and Ole Wae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 "Human Losse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91-95," The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er (RDC), Sarajevo. [Online] <http://www.idc.org.ba/presentation/content.htm> [Accessed 24 July 2009].
- Jørgenson, Marianne and Louise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 Krasner, Stephen,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uusisto, Riikka, "Framing the Wars in the Gulf and in Bosnia: The Rhetorical Definitions of the Western Power Leaders in Ac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5, No. 5 (July 1998), pp. 609~620.

- Laclau, Ernesto,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1, 2nd edition).
- Lawson, Stephanie, *Culture and Context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Luke, Timothy, "Postmodern Geopolitic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219~235.
- Malmvig, Helle,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Interventionary and Non-Interventionary Practices in Kosovo and Alger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 Milliken, Jennifer,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 Myers, Garth, Thomas Klak, and Timothy Koehl, "The Inscription of Difference: News Coverage of the Conflicts in Rwanda and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5, No. 1 (1996), pp. 21~46.
- Ó Tuathail, Gearóid,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21~56.
- Ó Tuathail, Gearóid,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14.
- Ó Tuathail, Gearóid, "Between a Holocaust and a Quagmire: 'Bosnia' in the U.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1991-1994," Gearóid Ó Tuathail, ed., *Critical Geo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87~223.
- Ó Tuathail, Gearóid, "A Strategic Sign: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Bosnia' in US Foreign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17 (1999), pp. 515~533.
- Ó Tuathail, Gearóid,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the War in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2002), pp. 601~628.
- Ó Tuathail, Gearóid and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15.
- Peet, Richard 著，王志弘等譯，*現代地理思想* (台北：群學，2005 年)。
- Petras, James and Steve Vieux, "Bosnia and the Revival of US Hegemony," *New Left Review*, Vol. 218 (1996), pp. 3~25.
- Powell, Colin, "Why Generals Get Nervo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92.

- Robinson, Bridget, "Putting Bosnia in its Place: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snia in the British Print Media," *Geopolitics*, Vol. 9, No. 2 (Summer 2004), pp. 378~401.
- Simms, Brendan, *Unfinest Hour: Britai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Bosnia* (London: Penguin, 2001).
- Smith, Steve,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9~245.
- Taylor, Peter J., "Radical Political Geographies,"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ard Toa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Basingstoke: Blackwell, 2003), pp. 47~58.
- Waever, Ole, "Explaining Europe by Decoding Discourses," in Anders Wivel, ed., *Explain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Copenhagen: Copenhagen Political Studies Press, 1998), pp. 100~146.
- Woodward, Susan, *Balkan Tragedy: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